

文化: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待深化的领域

——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之两种

张 泉

历史研究的主旨,是复原历史原貌。实际发生的历史即第一历史,后者已无法知晓。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所谓第二历史,即史学家根据历史遗存和文献构造出来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受到材料和治史者主观品格的制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现实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样,在不同的史学家那里,往往会形成有所不同、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海内外近代中日关系史、特别是近代日本侵华史研究领域里的众声喧哗,印证了这一点。

2005年,北京昆仑出版社醒目地推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四种,包括王向远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以及齐红深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对日本侵华教育的研究与批判》。这套丛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日本侵华史研究的范围集中深入到文化范畴,追根溯源,从文化的方方面面 对日本文化侵华罪行进行尖锐批判。而潜在的预期是,回应日本当代右翼文人歪曲历史、抹杀侵略史实的谬论,为现实服务。

日本侵华史是抗战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很早就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由于日本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侵华罪行最为直观且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相关研究比较充分,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比如,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已有一些权威性的著作问世,如王芸生的7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天津:大公报社1934年版)等。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日本侵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大事件、殖民统治和暴力罪行上。这类研究意义重大,仍需要加强,特别是罪行举证、损失调查和各类原始资料的系统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在日本暴力侵华罪行的背后,还有指导侵华行为的方针、政策、舆论宣传,以及配合侵华战争的文学艺术、文化工作、学术研究。只有把这些领域也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全方位地展现日本侵华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述及日本军国主义背景与殖民政策、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思想统制以及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资料、论文、著作开始增多。这一变化在大型学术丛书中也体现出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例,目前该文库已收入各类著作40部左右,其中,专门探讨文化侵略和殖民理论政策的有7部。昆仑出版社的这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则以其鲜明的主题,进一步推动学界和传媒对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史研究的关注。

由于《日本右翼言论批判》一书所针对的是日本当代右翼的新动向,不在近代日本文化侵华史研究的范畴之内,殖民教育又是研究相对充分的领域,故本文主要从其余两种著作入手,讨论与文化侵华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

王向远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首先对与侵略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加以界定:主要包括思想意识、学术研究、文学艺术、舆论传媒、宗教信仰、语言教育等等。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设想论证、宣传辩护,以及歧视毁灭殖民地本土文化、强行推行宗主国文化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语言文学等“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简言之,所谓“文化侵略”,就是“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人”。依据这个标准,该书分两个阶段描述了日本“文化侵略”的历史。

前7章描述日本文化侵略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主要揭示古代以来日本文人、学者、思想家和革命家对武力侵华问题所作的可行性论证和舆论宣传。古代有近松门左卫门的“侵华戏剧”(1715年)、佐藤信渊“征服中国的方案”(1823年)。近代有吉田松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1850年代)。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从“文明”论中找寻发动侵华战争的理论根据。德富苏峰提出先占领中国北方、然后南下占领台湾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江藤新平、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曾分别设计出肢解中国的具体方案,而藤井樽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年)、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1916年)与“脱亚论”相反,打着“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号,实际奉行“大日本主义”,是一种具有“怀柔形态”的虚伪侵华理论。在已经占领亚洲大片领土的现代,日本新一代“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侵华理论”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年)、大川周明的《大东亚秩序》(1943年)进一步阐发由日本独吞中国和亚洲的殖民构想。井上哲次郎的《东亚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39年)、桑原玉市的《大东亚皇化的理念》(1942年)则主张用“皇道”一统亚洲和世界,实现全球“皇化”。不少“东洋史”、“支那史”专家的学术研究自觉为侵华服务,主要代表人物有内藤湖南、矢野仁一、高岩、白鸟库吉、秋泽修二等。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专家也在著作中丑化中国人,“直接为侵华战争服务”。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的后7章描述日本文化侵略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具体实施阶段,主要梳理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的战时文化工作,包括对华“思想宣传战”和有关侵华事宜的对外宣传方针,“对支文化工作”,以及在华通信报刊、情报工作、奴化教育、布道传教等诸多方面。

该书广泛收集和集中展示各种日文文献中出现的与“文化侵略”相关的材料,清理出日本文化侵略思想与方略的发展轨迹,以及沦陷区殖民统治中的文化内容,大体上构造出各下属文化领域或门类的基本框架。材料的丰富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见出。一是视野广阔,对于非正式出版物也予以关注。比如,日本的东亚研究所在20世纪40年代初编印的油印材料《日本在支文化事业》。另一方面,注意从常见文献中发现具有再认识价值的材料。比如,该书从16卷本的《福泽谕吉全集》(1961年)中找出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将其界定为“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从而展现了这位日本近代史上最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另一面。对于一些在中国享有较高声誉的日本汉学家,也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出歪曲历史、丑化中国、为日本侵华行径制造舆论或辩解的部分,予以剖析。

在评价日本的历史人物时,作者始终刻意突出其与狭隘民族主义相关的部分,这可能会给人造成片面或偏激的印象。不过,每项研究有其特定的目标,研究对象的内容往往制约着叙述方式。在资本主义列强武力拓展领土的全球殖民时代,日本锐意维新图变,强烈渴望跻身强国行列、摆脱落后挨打地位。这是每一个发达独立民族国家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但日本迅速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进程,是与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形影相随的。对于本民族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有其基本的评价。但是作为日本现代化的直接受害方,中国学者突出他们的鼓吹侵略扩张的方面,理所当然。但这项研究的价值或许在于,有助于我们重视探讨近代日本为何能够在对外侵略上达成举国一致

的文化根源。

近代日本文化侵华史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立场鲜明、思路清楚、材料翔实,但也只能做到提纲挈领,因为文化侵略的每一下属部门都需要分学科、分时段、分地区整理出准确完整的资料,逐一进行专题研究。比如,受篇幅限制,该书中的《日本对华奴化教育与日语教学的强制推行》一章,只是通过两三个并非等位的面和点,来批判日本主要采取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日本在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是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具有实施时间长、涉及地域广的特点。教育,特别是语言殖民和文化殖民,需要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育体制的支持以及设施、教员、教材等条件的完备,更需要离开战事的空间、时间以及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群。中国大部分沦陷区一直与战火和战乱相伴,奴化教育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在各地都形成能够实现预设目标的规模效益。因此,各殖民地地区的情况相去甚远。或许系统的个案调查更能还原历史,实质性地推进奴化教育研究。在这个领域,海内外学者也已经出版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汇编和论著,包括这套丛书中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一书,而且相关研究还在不断深化。丛书中的另一部书《“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实际上就是日本文化侵华研究在文学学科里的一种细化。这样的细化,对于提高日本近代文化侵华史研究的整体水准,至关重要。

所谓“战争文学”,是该书展开论述的一条主线。该书申明,日本的“战争文学”一词不是中性词,包含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看法”。因此,作者用“侵华文学”来界定日本的“战争文学”,即把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从一般的“战争文学”门类中分离出来,明确标示出其“军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性质”,使其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据此,整理出日本文学家为侵华战争服务的言行,加以批判。

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样,材料充实,立论鲜明是《“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的突出特点。在概述了日本侵华国策的思想渊源及其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反映之后,该书分别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为东北殖民统治秩序服务的“开拓文学”和日系“满洲文学”;七七事变后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笔部队”即特派随军作家和军人作家的侵华文学;并且对一些典型的文学现象,如充斥日本文坛的侵华诗歌,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文学”,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鼓吹“大东亚主义”的活动及文学作品等等,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或引起歧见的侵华文学作家,如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作了专题研究。此外,还对日本的所谓“反战文学”,以及日本战后文坛对战时文艺界的认识,作了细致的辨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例如,该书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没有“反战文学”,“侵华文学”是日本文学的主流。对于这一点,中国和日本学术界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通过金子光晴等个案,该书提出,判断一个作家“反战”与否,应当以战争期间发表的作品而不是以战后发表的作品为依据。并据此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中的日本两卷,收录战后作品的做法,严加质疑。

再如,该书细致地拈出一系列材料,有力地支持了侵华文学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这一论点。如火野苇平的小说《花与士兵》中有关日军士兵误用马桶作饭桶的细节描写,证明了日军对中国老百姓的侵扰。在评介藤田实彦的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时,从作品中摘引出这样的记述:日军攻入南京后,着便装混在老百姓中的中国军人,“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这的确是证实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又一个有利证据。这样的证据与美国入贝德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德国人拉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一样,很有说服力。

可以说,该书集中展开了一个以往的研究注意得不够的领域,为深化相关论题提供了良好的界面。正是基于此,在予以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尝试例举《“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的某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内容或提法。

首先,日本通过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割占我国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后来又通过日俄战争,取代沙俄统治辽东半岛。对于这一时空中的日本侵华文学,还有待补充。

第二,学术研究的演进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其自身渐进、多元的轨迹,包括日本学界对待侵华文学的态度问题,也是这样。在梳理学术源流时,应当尽可能全面,注意发掘有助于正确认识历史的积极因素。比如,在国内,对于白鸟库吉的意在否定中华文明源头的“尧舜否定论”,早有学者予以反驳。在日本,中村新太郎的《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等著作,对日本侵华文学持否定的立场。

第三,研究日本的对华文化侵略,无疑会涉及那些介入殖民地文化活动的中国文人。在论及他们时,应逐一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加以考察。《“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介绍了一批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中国作家。现在的研究逐步揭示出,邱韵铎、鲁风、关露等人是中共情报人员。还有不少人在当时和后来属共产党系统。丁震来自重庆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领导人陶晶孙,在知名官员作家夏衍撰文说他当年是在为中共工作后,才得到澄清,他的包括沦陷时期在内的旧作,得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参加官方活动的言和行,只是表象,不一定对他们的文学定位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张我军、龙瑛宗、张文环、杨云萍,他们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家。

第四,两书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照片以及许多引文缺少注释。这是学术著作,特别是一部以使用第一手日文资料为主的著作,所应当力避的。换一个角度看,从著者对该书设定的使命来说,也只有——标明原始出处,才有助于实现保留“罪案”、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现实意图。

著者对自己从事日本文化侵华史研究的使命做了明确表述:“本书也可以算是对‘跳梁跋扈’的日本右翼学者们的一次小小的回敬。近二十多年来,日本右翼学者大量著书刊文,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不择手段地抹杀侵略史实,千方百计地证明日本所发动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将中国等亚洲国家从西方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本书所揭露的战前与战中的日本文化人的有关言论,却分明是在明火执仗地鼓吹对华侵略、赤裸裸地主张奴役中国。这些日本当代右翼学者们看了自己的这些先祖与前辈的言论,又会作何感想。”(《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后记》)这一立场或视角,深刻地影响了作者的选题和材料的取舍,也影响到叙述话语,出现一些溢出学术范畴的形容语汇,比如“某种心态的一次大暴露”、“令人触目惊心”、“狼子野心”、“火上浇油”、“日渐猖獗”、“可耻失败”、“煽风点火”、“极为恶劣”、“惊人论断”、“叫嚷”、“最大也最恶劣”,等等。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著者的强烈的民族立场和反拨激情使然,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面对言论自由的邻邦不时出现的置基本事实而不顾的翻案言论,每一个曾遭受近代殖民之苦的国家的公民,都会产生同样的愤慨,都会加以针锋相对的批判。不过,如果批判的定位是学术回应,在描绘和辨析历史时,有系统地以史料作依托的定量陈述就足够了。当然,这不会损害上述著作的价值取向和开拓功绩,反而说明,深化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研究,既有历史学术价值,也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应当引起重视。

(作者张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